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

突破封锁访延安

——1944 年的通讯和家书

伊·爱泼斯坦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伟光

封面设计：田冰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突破封锁访延安 / 伊斯雷尔 · 爱泼斯坦著；

张扬 等译。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4

(国际友人丛书)

ISBN7-80002-746-5

I. 突...

II. ①爱... ②张...

III. ①通讯—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爱泼斯坦—作品
综合集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703 号

突破封锁访延安

— 1944 年的通讯和家书

原著者：伊斯雷尔 · 爱泼斯坦

译 者：张 扬 张水澄 沈苏儒译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发 行 者：新 华 书 店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印 刷 者：北京科技印刷厂

199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 字数：128 千字

ISBN 7-80002-746-5/G · 216

定 价：7.80 元

《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 华

总主编：爱泼斯坦 高 梁

顾问：许力以 萧 乾 段连城 玛拉沁夫
赵 寻 裴克安 解力夫 毕朔望

编辑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新善	许 邦	田家农	伏 瑥
任鸣皋	沈昌文	李 倪	孟纪青
周长志	林戊荪	林尔蔚	林君雄
罗尔庄	陈休征	陈志强	陈秀霞
顾子欣	高 梁	崔 烈	黄 华
谢善骁	爱泼斯坦	蒲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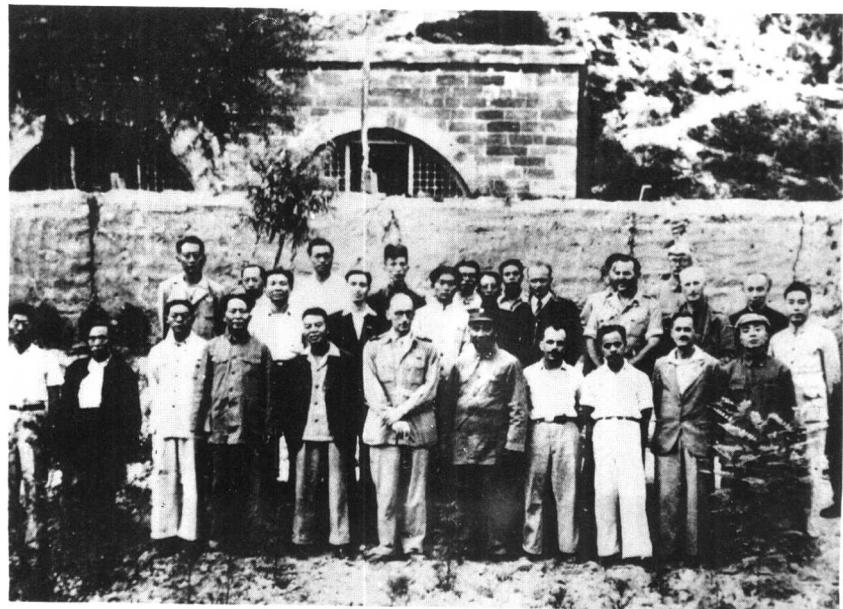
爱泼斯坦在工作 张水澄摄



在延安枣园毛泽东主席接见来访记者团中的六位外国记者：

后排右起：毛主席、史坦因、夏南汗

前排右起：福尔曼、爱泼斯坦、普金科、武道



毛主席(左四)和朱德(左七)接见中外记者团所有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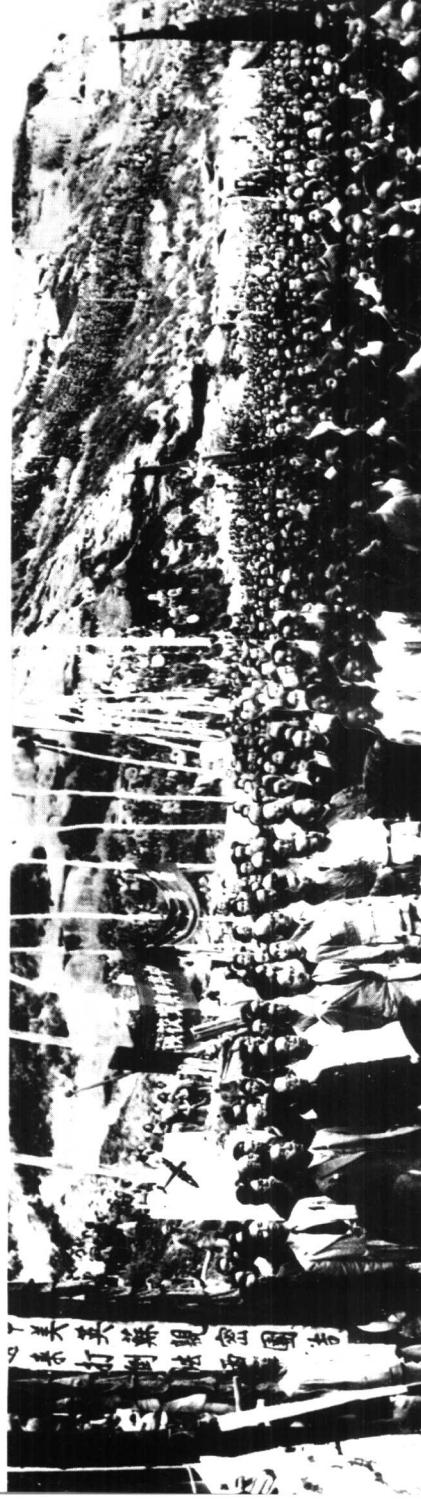


在延安王家坪更多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见中外记者团

前排左起:2. 王震,6. 朱德,9. 周恩来,10. 贺龙,11. 林彪,7. 李鼎铭,1. 爱泼斯坦,5. 记者团长谢保樵,后排右一为杨尚昆



一九四四年在延安边区第一位迎接记者团的王震(右),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又和爱泼斯坦会面了。



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期间，在延安文化沟两万五千人集会，庆祝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一九八五年本书作者又来到晋北的关头村，这里曾经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第八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当天全村老少出来欢迎作者。（张水澄摄）



作者（右起第三人）在关头村和老同志们交谈（张水澄摄）



在晋西北，深入敌后战场的三个外国记者，左起：爱泼斯坦、武道、福尔曼。



一九五一年作者和妻子邱茉莉来中国后摄于北京。一九四四年当作者访问延安期间，邱茉莉被迫留在重庆，在那里她为争取作者的通讯稿通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作了不懈的斗争。

此复印件系国民党及美国部队新闻检查官对爱泼斯坦撰写的“一个美国飞行员被营救”一文的批件。

RECEIVED BY U.S. AIR FORCE CHECKING OFFIC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ENZHEN AUGUST TWENTYSEVENTH CENSOR REFER CHOLMELEY COLON PARENTS
OF TWENTY THREE YEAR OLD JOSEPH PAUL BAGLIO AMERICAN FIGHTER PILOT EX BOSTON MASSACHUSETTS WHOM JAPANESE SHOT DOWN BUT DIED NOT DROWN DEEP IN OCCUPIED NORTH CHINA WILL BE GLAD TO HEAR THAT FOREIGN CORRESPONDENTS TRAVELING TO EIGHT-ROUTE ARMY FRONT MET THEIR SON SAFE SOUND BUT BROWN CHEERFUL MURRY IN OPPOSITE DIRECTION TOWARD YEMAN STOP BAGLIO WAS PICKED UP BY PEASANTS AFTER BAILING OUT ONLY COUPLE OF MILES FROM JAPANESE COLUMN WHICH HE HAD BEEN STRAFING ALONG ROAD STOP PEASANTS NOTIFIED COMMUNIST LED GUERRILLAS

本
文
中
所
述
事
件
是
否
实
在
不
可
知
但
如
果
真
有
这
样
的
事
情
发
生
在
中
国
那
么
不
仅
是
中
国
人
而
且
全
世
界
人
民
都
会
深
感
痛
惜
和
不
平
等
如
果
真
有
这
样
的
事
情
发
生
在
中
国
那
么
不
仅
是
中
国
人
而
且
全
世
界
人
民
都
会
深
感
痛
惜
和
不
平
等

中文的“判决”是“请国际台选检”;美军部队检查官则予以“枪毙”。
另一篇“边区印象记”,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结果是“免登”。

《国际友人丛书》总序

□黄 华

在我国首都和地方一些中外文出版社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友人丛书》即将陆续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国际友人而作出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创举。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各个时期里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有的渴求真理,公正地介绍中国实况,赢得了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的呕心沥血,忘我无私,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闪烁着永恒的耀眼的光辉。

他们是各国伟大人民的优秀儿子和卓越代表。虽然在国籍、肤色、语言、专业上各不相同,也各因不同处境而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同情和爱戴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能为此作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中国人民因有这么众多的国际友人而自豪。他们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像雨露和阳光,使我们从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不少人留有自己的著作,包括自传、日记、书信等;也有中外作家、学者、亲朋好友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传记或回忆。这些著作大都记载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体现着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

的深切情谊和期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其中有些已被世界公认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必读的名著。无疑，这是国际友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这些著作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三四十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是在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后而走上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著作又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然而，这些著作中，有的因年久而已失传或绝版；还有不少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为中国广大读者所不晓。许多国际友人未留有著作，但关于他们的事迹却流传不少，尤其是那些如今健在而已年近古稀的国际友人，他们仍保有不少资料急待加以整理。因此，发掘整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抱着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由各有关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和一些中外专家组成了《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这套丛书将以国际友人的传记为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作。除中文版外，还出版一些外文原著。我希望编委会经常同作者、译者、中外朋友和广大读者们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能够集思广益，发掘选题，确定书目，保证出书质量，向中外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介绍国际友人的著作。

今天，全国人民正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发前进。编辑出版国际友人的著作，介绍他们的光辉事迹，发扬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不仅对国际友人是种纪念和慰藉，对国外广大朋友是种鼓舞，而且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我相信，当我国青年一代读到国际友人这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迹时，一定会激发出更加巨大的爱国主义

热情,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当读到这些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艰苦而光荣的历程时,一定会更加珍惜中国革命前辈用生命和血汗创造的业绩,更加发扬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革命传统;而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更会启发我们青年一代广开眼界,培育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同可爱的祖国和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我想,《国际友人丛书》的出版,也是为了表达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无限感激和永恒的思念。没有这些国际友人的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难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

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永放光芒! 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作 者 序

1995年，在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全世界范围来讲，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联合作战共同击败法西斯也已半个世纪。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的伟大意义，在我80岁诞辰之际，谨以我在1944年至1945年所写的简短通讯及家书合编成一本集子，作为我的一点贡献。这些通讯、家书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延安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根据地发出的，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怀着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强烈感情，根据我所见所闻而写的印象和评述。在年纪稍长一些的读者中，这些文字记载会重新唤起他们的回忆或给他们的记忆中增加一些东西。假如今天年轻的读者能从这本小集子里汲取一些在那个艰苦复杂但充满朝气的年代中我所见所闻的一些事物和思想感情，并对小集子中的叙述有一种新鲜感，我将无比欣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序幕，对这个序幕不甚了了，是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的。

总的来讲，这本书包括了1944年5月到9月发往《纽约时报》的25篇通讯。当时我是作为该报派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书中还包括我当时写的其它一些文章和家信。参观团包括6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

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事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这种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力量，从埃德加·斯诺的首创篇《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以来，已经发展了几十倍。继斯诺之后，在1937年至1939年间，又出现了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水平上乘的目击者报道。自此以后的5年间，新闻记者及其他对这些地区身临其境的接触被国民党重新颁布的交通封锁禁令所阻隔，一直到我们冲破封锁再次进入这些地区为止。

我们终于能够成行的部分原因是当年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不懈斗争的结果。但远不止那一个方面，因为当时有着一种广泛得多的国内和国际氛围存在。对今天的读者来讲，简短回顾一下诸多其它因素是有裨益的。

在重庆，许多处于战火中国家的记者出于尽早打垮日军的愿望，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想去亲眼看一看并告诉他们的千百万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同盟军的一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着战斗的。作为一直否认这支部队在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当局则一再拒绝记者们的申请。延安却恰好相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明确表示，记者们不仅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包括敌后的前线，以便对他们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答案材料。这个答案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重要，而且对整个亚洲战场同样是重要的。当时，在欧洲，战胜纳粹德国已指日可待；而在中国，日本正经过广西、湖南向贵州作最后的强有力的进攻，直逼重庆，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攻势下已溃不成军。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借此就要攫取全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还会把战争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呢？作为已经把日本人从以前称之为“占领区”的地

方赶了出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宣称，他们领导的抗日力量已强大到不只保证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且在盟国军队把军事力量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亚洲来彻底打败日军时，他们能够在与盟军进行有效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案对盟国政府和盟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同国民党发言人毫无成效的辩论之后，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驻重庆的外国的军事和外交代表们。

在所有这些压力面前，蒋介石政府才决定允许记者团出访，但作为控制手段，它又提出许多先决条件。其一是，记者团作为一个集体，应由一个国民党官员任团长，并包括一定数量的政府各宣传媒体的记者。第二个条件荒谬至极，即每篇通讯必须经过新闻检查，来自共产党的每一论点必须包含国民党的批驳之词。更有甚者，因为长时间不准记者访问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国民党坚持此次出访至少要3个月。可以想象，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从另一方面讲，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它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磨擦，而国民党的“团长”正巴不得利用这一机会极尽挑拨之能事。事实上，国民党果真这么干了。最后，由于规定了最少3个月时限的原因，大部分重庆的记者，特别是美国部队的特派记者，因正忙于采访滇缅前线的中美联合军事行动，与此发生矛盾，结果除几个人之外，都不能成行，因而也阻碍了报纸给予他们太多的篇幅。

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出访确是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漏洞百出，由于做的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而最最关键的是，记者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

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解放区获得了巨大胜利；同时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随后，美国军事观察团抵达延安。他们也深受感动，大多数人呼吁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合作，提供援助。这一行动也受到了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赞同。这一局面由于后来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而遭到破坏。这也是美国最高领导层决定自此只与国民党合作而采取的第一步。最后导致了美国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直至解放后中美关系中断达 20 多年之久。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 1944 年 6 月间赴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团的其它方面。像国民党估计的那样，他们是少数，只有 6 个人。在这 6 个人中间，还有精心挑选的两个他们所信任的、站在反共立场唱反调的人。在最后一刻，他们不顾所有在重庆的记者们的一致联名抗议，擅自取消了另外一个记者、我的妻子爱尔茜·邱茉莉作为记者团一员的权利，她当时是受加拿大和英国报纸的委派，准备和我们同行的。提出的貌似公允的借口是，此行对一个妇女来讲，太艰苦了！其实是他们认为她倾向于共产党。

但是，尽管去的记者为数有限，他们却直接代表了总数两倍于他们人数的主要西方通讯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及苏联的塔斯社。其中有人身兼二职甚至三职的。事实上，其中有 3 个人，哈里森·福尔曼（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等）、我自己（代表《纽约时报》、美国《时代》杂志等）和毛里斯·武道（代表美国《巴尔地摩太阳报》），不仅去了延安，还到了抗敌前线。他们不仅写了几十篇新闻报道和文章，在全世界报刊上发表，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